

# TELL ME NO LIES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and Its Triumphs

[澳]约翰·皮尔格 (John Pilger) 选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牟磊 等译

## 别对我撒谎

23篇震撼世界的新闻调查报道

为历史写下「初稿」的任务已经被西方新闻体系抛弃了！  
如今新闻正在宣扬一种用意含混不明的帝国主义，有的在言  
当记者们对这种讹误听之任之的时候，他们就不是在告

地默许。

IIS  
8

TELL ME  
NO LIES



# 别对我撒谎

23篇震撼世界的新闻调查报道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and Its Triumph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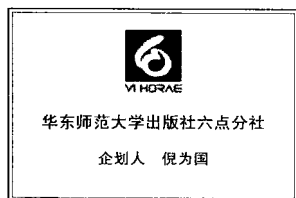
◎ [澳]约翰·皮尔格 (John Pilger) 选编  
◎ 牟磊 等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别对我撒谎——23篇震撼世界的新闻调查报道/(澳)  
皮尔格选编;牟磊等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5617-4233-4

I. 别… II. ①皮…②牟… III. 新闻报道-作品集-世界-现代 IV. I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23317号



### Tell Me No Lies: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and Its Triumphs

Edited by John Pilger

Selection, introduction and chapter prefaces copying © John Pilger, 2004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by Jonathan Cap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John Pilger c/o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Ltd. through Bardonia-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05-528 号

## 别对我撒谎——23篇震撼世界的新闻调查报道

(澳)约翰·皮尔格 选编

牟磊 等译

统 筹 储德天 王海

责任编辑 审校部编辑工作组

特约编辑 倪为国

美术编辑 吴正亚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http://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上海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插 页 2

印 张 31.5

字 数 510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4233-4/C·105

定 价 68.0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 序：真相与救赎之道

陈保平

如果不是在有阳光的早晨，要持续读这本约翰·皮尔格编的《别对我撒谎》，心情是沉重和压抑的。人们面对真相并不容易。但当你读完这 23 篇报道，内心如果不涌起一点激情，我们对人的良知便会产生怀疑。我相信，所有读完这本书的人，都会对书中那些记者由衷地敬佩，可以说，他们都是以生命为代价影响了世界进程。他们的荣耀一点不亚于诺贝尔获奖者。

从达豪死亡集中营到麦卡锡主义的威胁，从揭发南非种族隔离政权行刑队到洛克比空难真相的揭示，从卢旺达大屠杀中西方世界的角色到对德国外籍劳工悲惨生活的展示，一直到师出无名的伊拉克战争，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记者对历史的呈现和尊重，而且在这呈现和尊重的过程中，看到了人性最美丽、最优秀的一面。与此同时，我们对近一个世纪来，西方世界发达繁荣背后的虚伪与残忍有了更深的认识。《别对我撒谎》的书名，隐含着尖锐地责问：“谁对我说谎？”“为什么要对我说谎？”这种责问让我们思考的深度不止是说谎者本身。

约翰·皮格尔这本书的另一个启示是，随着近年来互联网的发展，传统媒体把自身的疲软与褪色推到了科技身上，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么简单。新闻的核心价值是真相，而真相主要是通过具体生动的细节和准确的数字来证明的。在这本书里你可以看到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是通过男女记者（有学者说，近年来全球女记者的表现已让人对女性新闻工作者刮目相看）深入虎穴，才写出了有深度和广度的报道，从而改变了世人对事件的看法，改变了事件的走向，这些都不是科技本身能做到的。即使有一天，网络作为媒介取代了传统媒体，记者的正义感、勇气、思想、采访技巧、文字表达能力仍是这个领域最重要的资源，离开了人的网络并不会告诉人们真相，而公众追求公正平等和真相的普遍意志是任何一种媒介都无法违背的。所以，在资讯泛滥、浅层信息遮蔽真相的当下，新闻调查报道应该成为新闻院校和

记者培训的重要内容,只有具备采写新闻调查报道的能力,才称得上是优秀记者。

九十年前,韦伯(Max Weber)在对德国大学生演讲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记者每天或者每周都必须随‘市场’的需求,对任何一件事、对生活中任何可以想象到的问题迅速(回应)……这是会有不堪卒睹的后果的,因此,许多新闻工作者到头来在人性方面完全失败,丧失一切价值也就不足为异。”韦伯接着还说,面对影响力的旁落、社会地位的尴尬与工作情境的不堪,“值得吃惊的,是在这样情况下,这个阶层中居然还有许多可贵的、道地的人存在……这条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走的,性格薄弱的人,绝对不能走这条路,特别是那些只有在安定的地位才能维持心灵平衡的人。”(钱永祥译文)韦伯虽是一位西方哲学家,但他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救赎之道不乏精辟之见,也印证了本书许多作者作为可贵的、道地的人的存在。只是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新闻观相比,他把这份救赎完全寄托于记者的个人英雄主义显然是有局限性的。揭示真相是改变历史的前提,但改变历史仅仅靠记者呈现真相是不够的。

## 译者序

牟磊

凭经验和敏感发现,再通过调查分析锁定现场。多方查证,取得线索。缩小区域,定位。向下挖掘,向周边扩张。继续挖掘,清理覆盖在事物表面的泥土,同时记录 and 收集发现物,分类整理,保护现场,最终渐次重现事物的原貌……我在这里所描述的并不是一次田野考古,而是新闻调查报道的工作。这两项工作之所以如此相似,首先是因为相似的发掘方法带来同调的过程之美。

不仅是方法和过程。新闻调查报道的作品也和考古发现的结果不无相似:二者都具有一种震慑人心的真实之美。这两种真实,一种被深埋于历史的烟云,一种被掩盖于现实的迷雾,一旦重见天日,当即改写世间固有思维。因为“这才是真相”。

然而相似之下又大有不同。考古发掘工作浩浩荡荡、堂而皇之,而新闻调查报道却总是艰险重重、波诡云谲,所涉人事往往利害攸关,调查者常常临深履薄,甚至应该比喻成盗墓才更为合适。发掘遗迹都是兵团作战,新闻调查却往往是三两人行动,更不乏只身闯荡的独行侠。一台打字机、一部相机、一个小旅馆的房间、一部电话、几瓶烈酒,这就是他们的全部装备。有时候还需要一把防身的手枪。

在翻译这本选集的一年里,我逐字逐句跟随着编者约翰·皮尔格和其他世界最顶尖的调查报道记者,重访了几乎 1945 年以来所有世界重大新闻的现场。在 50 多万字的翻译工作中,新闻调查报道首先呈现在我面前的价值是它天然的美感:其严密细致、如同医学研究般严峻的方法;其迂回曲折、水落石出的精彩过程;还有最终作品展现出的强大真实感。

这本书中的每一位记者都堪称是新闻调查这门艺术的大师。西摩·赫什穿行在美国大地两年,行程 5 万英里,遍访军营酒肆和人家,全靠当事人噩梦般的回忆和无数疯狂的心理细节观察,才活生生重现了越南美来村的血腥一日。罗伯特·菲

斯克在以色列军队和长枪党民兵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之后,抢先进入黎巴嫩夏蒂拉难民营,他从描述自己循着几百万只追逐尸臭的苍蝇发现屠杀现场开始,一直写到事发之后对屠杀幸存者的逐个回访,自身的亲历加上多角度的访谈,便层层交织出他的报道。保罗·富特对洛克比空难背后阴谋的调查从1989年一直持续到2001年,在他主编的《私家侦探》杂志上一路连载报道,其间抽丝剥茧,凭着强烈的怀疑精神,从堆积如山的人证物证和纷繁的庭审记录中剥出了事实真相。

然而,皮尔格精心铺陈出的这数十篇报道带给我的远远不止于对新闻之美的沉醉,也不止于对作者们技艺胆识的叹服和对他们经验的汲取。随着对每一篇报道的翻译,我一次次进入不同时代背景和不同的地理、文化,一次次查证原稿中涉及的人事、史料、当年的话语、文本。我开始进入一座座洞开的深穴。

沿着这些记者当年的足迹,我亦步亦趋,借着手中的亮光慢慢前行。这些墓穴有的已尘封多年,盖棺论定;有的还未封土,仍有无数蛛丝马迹等待着后来者的追问。唯一相同的是,洞穴内的景象和我们平日在外间的所想所见所知,几乎都是迥然相异。每一件或胡乱堆放、或齐齐排列着的遗物,即便之前都是似曾相识,现在却似乎都重新组合了一遍,讲述起另一个版本的故事。探究这些不同的版本,思考在当时和事后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版本,乃至有种种虚构、矫饰、掩藏,成了这本报道选集带给我的更大启发。

渐渐地我发现,在这些事件与事件之间又有千丝万缕的关联。我在一片现场的一条甬道里走到尽头,发现它忽然又连上了另一片现场的甬道。等我将这60年的世界现场逐个蜗行一遍之后,我依稀看见了它们连在一起的全貌:1945年广岛的废墟和1975年荒芜的金边城,2000年佛罗里达州的总统大选计票现场和2003年伊拉克费卢杰的炮火,1989年苏格兰洛克比的上空和1996年重围之下的加沙地带……无数暗流在20世纪的地层之下涌动,串联起一个个表面看来相距很远的土地、人民、政权,灾难、喧嚣、冲突。而在这一地层之下,又有以往时代各各相连的一片片遗迹,有的已经湮没,有的还露出残砖断瓦。一层层的浮土不断掩过杂沓的脚印,旋即又被新的脚印覆盖。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就是每个人永远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却又最难回答。很多时候这个问题甚至都不会再有正确的答案。我仅举一例。就在这本书即将付印前,全世界的媒体聚焦到一条新闻上:英国当地时间2009年8月20日下午,英国苏格兰司法部门宣布,出于人道主义理由释放制造洛克比空难的主犯——利比亚人梅格拉希,因为他已病入膏肓。梅格拉希获释的消息在美英引起巨大争议。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苏格兰方面的决定是个错误,美国反对这个决定。很多美国遇难者家属对梅格拉希提前获释表示愤怒,认为这对遇难者家属来说简直是侮辱。可是,当年在洛克比究竟发生了什么?在围绕着这条新闻的种种喧嚣中,这个疑问

声已经很微弱了,仅有当年保罗·富特的调查报告还剩些许回响隐隐传来。洛克比空难背后的真相因为被层层掩盖,至今仍未大白于天下。这桩20年前轰动世界的大新闻,在20年后的今天已经成为了真相不明的历史。同样,有怀疑称这次梅格拉希获释与英国在利比亚的石油贸易有关,但苏格兰当局发言人当即否认。很快,这条今天的新闻又会成为模糊的历史,连同本就已经模糊不清的,关于洛克比空难的一切。

为什么我们不知道真相?这恐怕是每个人永远要问的第二个问题。这也是这本报道选集最终要向大家揭示的:为历史写下初稿的任务早已被西方新闻体系抛弃。这本选集的思想灵魂所系当属编者皮尔格的挚友,美国思想家诺姆·乔姆斯基,他曾经三言两语就说明了个中的缘由:今天的大众新闻媒体都由大财团拥有,基于广告营收的商业诉求必然会驱使媒体远离新闻的真实性原则,而趋向更加有利于利益集团整体利益的选题和报道角度。这一切都在自然而然间发生,而当记者们对这种讹误听之任之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是在惑众了。如此一来真相何存?

皮尔格曾说:“作为记者,把自己仅仅看成是报信的人是不够的。在每一条消息和围绕在其周围的各种说法背后,总是隐藏着幕后的动机,这也是记者必须知道的。”此话朴实,像是皮尔格作为一位成功的记者在勉励后生同行,可“探究幕后的动机”远不仅是对一名好记者的技术要求而已。他和这本书里的所有作者正是从认定这一点开始参透了新闻的真义,藉着怀疑精神向西方政治商业集团和他们宣扬的主流神话发起巨大的挑战,践行着真正知识分子的责任。

纽约时报大楼的大堂有一件装置艺术作品:无数个带硬盘和喇叭的小显示器整整覆盖了两面墙,每一个小显示器上都在不间断地滚动着从当天的新闻里随机抽出的词句,凑近了还能听见有声音喋喋念着。站在这两面墙中间,满耳便是一片嗡嗡之声。这就是我们当今生活的写照:我们活在新闻里,被表述出的新闻甚至已经成了生活本身。新闻即是我们对今天世界的认识,也将是历史。

正如翻译这本选集给我带来了种种启示,我相信读者们也一样会在阅读中有惊人的发现。唯一遗憾的是,原著中有更多的篇什,因为部分文章的中文版权未能落实,即便已经译出,最终也未能面世。若加上这几篇,这个世界的隐秘图景将会更加完整清晰一些。这些文章是:詹姆斯·卡梅隆<sup>①</sup>的《镜中奇遇》(*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1966)、爱德华多·加莱亚诺<sup>②</sup>的《颠倒的世界》(*The*

① 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英国著名的驻外记者。在西方记者中,他第一个去到了北越战场胡志明市的这一边,报道美国在越南的这场战争。在其书《见证人》(*Witness*)中,卡梅隆以高超的叙事能力表达了电视无法表达的东西。

②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出生在乌拉圭,是拉丁美洲最大胆的记者、作家、历史学家和诗人之一,著有《拉丁美洲割开的血管》(*The Open Veins of Latin America*)、《火的记忆》(*Memory of Fire*)等。

*Upside-Down World*, 1998)、埃里克·施洛瑟<sup>①</sup>的《快餐国家》(*Fast Food Nation*, 2001)、大卫·阿姆斯特朗<sup>②</sup>的《全球统治计划》(*Drafting a Plan for Global Dominance*, 2002)和爱德华·萨义德<sup>③</sup>的《对伊斯兰教的报道与掩盖》(*Covering Islam*, 1997/2002)。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家人和友人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我很乐意和他们分享这本书最终面世带给我的欣喜,他们是:我的妻子余琦、本书的编辑何家炜和朱小文、好友姜白、詹晨。我还要感谢我在广外时的老师,乔姆斯基的学生宁春岩教授,正是他让我第一次知道了这位伟大的学者。

2009年12月28日 上海寓中

---

① 埃里克·施洛瑟(Eric Schlosser),文章选自其划时代的著作《快餐国家:全美式饮食的黑暗面》(*Fast Food Nation: The Dark Side of the All-American Meal*),书中深刻揭露了全球化快餐业的秘密。

② 大卫·阿姆斯特朗(David Armstrong),美国国家安全通讯社(National Security News Service)华盛顿分社的社长,这个相对不大的通讯社专门从事新闻调查,长久以来因擅长披露政府内幕消息而出名。

③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流亡美国的巴勒斯坦人,著名的学者、文学批评家、作家、诗人和音乐家,其一生写了大量关于巴勒斯坦人争取民族自决的著作。

谨以本书纪念保罗·富特

## 致 谢

感谢乔纳生·凯普(Jonathan Cape)出版公司的约尔格·汉斯根(Jörg Hensgen)先生,汉斯根先生不仅提出了编辑本书的创意,还为本书慷慨地奉献了卓越的编辑工作,没有他,本书绝不可能问世。同样一如既往地感谢本书责任编辑简·希尔(Jane Hill);感谢为本书设计了精致封面的安德鲁·霍华德(Andrew Howard)。同时感谢雅克利娜·科恩(Jacqueline Korn)、安·坎宁安(Ann Cunningham)、埃里克·赫林(Eric Herring)、约翰·曼瑟普(John Manthorpe)、维基·罗宾森(Vicki Robinson)、萨拉·巴洛(Sarah Barlow)、曼迪·格林菲尔德(Mandy Greenfield)和凯特·沃登(Kate Worden)。

## 文 本 说 明

本书选录的部分著作节选和文章有节略之处,并省略了注释和参考文献。删除的文本部分,在本书中表示为单行空白;双行空白则表示原文中原有的文章分块,或者原文中新章节的起始。读者如果希望阅读著作节选的全文或者全书,请参考书后资料来源附录中的书目。

书中的脚注除标明“作者脚注”之外均系编者所加,其目的是向读者提供解释性的细节或者背景信息。

## 序

任何一个读过历史的人都能看到，不服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美德。

——奥斯卡·王尔德

本书封底上有我特别钟爱的一段话，出自美国记者奥尔曼(T. D. Allman)。在他看来，“真实客观的新闻不仅要准确记录下事实，而且要准确表达出事件的意义。这样的新闻不仅在当时令人信服，而且足以接受时间的考验；不仅因为其消息来源可靠而产生广泛的影响，而且将会在历史的演进中接受证明。10年、20年、50年后，这些新闻报道仍然能为有关事件提供真实而睿智的镜鉴。”

奥尔曼的这番话是为了纪念威尔弗雷德·伯切特(Wilfred Burchett)，这位记者非凡的职业生涯常常是硝烟弥漫，其中包括了被誉为“世纪独家新闻”(the scoop of the century)的那次报道。1945年，盟军占领日本，成百名随军记者被牵到戏剧性的盛大投降仪式上，伯切特却没有去，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摆脱了狗链”，开始了冒险的行程——奔赴一座已经铭刻于人类意识深处的城市：广岛。在原子弹爆炸后，伯切特是到达广岛的第一位西方记者，他发表于伦敦《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头版的报道有一个预言家式的标题：“我写下此文，向世界发出警告”。

伯切特警告的是核辐射的毒性，而占领军当局一直否认毒性的存在。伯切特遭到了声讨，很多同行记者也加入了异口同声的谴责之中。伯切特孤军奋战，勇敢地揭示了核战争的恐怖全景。正如1983年伯切特去世之际奥尔曼所言，伯切特的报道被“历史的演进”证明准确无误。本书也收录了伯切特的这篇电讯。

奥尔曼的赞美适用于本书收录的所有文章的作者。对我来说，选编本书是极大的荣幸。本书中这些记者的重量级都和威尔弗雷德·伯切特、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詹姆斯·卡梅伦(James Cameron)、爱德华·默罗(Edward

R. Murrow)等人不分伯仲,重新给予这些“被遗忘的”作品以荣耀,这是个机会,也是一记警钟,它提醒我们,人类最高贵的斗争之一就是抵抗强权和反抗强权对历史的操控。伯切特笔下广岛的意义,盖尔霍恩对种族灭绝的披露,卡梅伦对越南反美战争的报道,连同当代新闻记者,像保罗·富特(Paul Foot)、罗伯特·菲斯克(Robert Fisk)、琳达·梅尔文(Linda Melvern)和索马斯·米尔恩(Seumas Milne)等人的作品,不仅昭彰了正义,也让当权者有所忌惮。这正是新闻至高无上的使命。

在此需要重新解释,甚至重新定义书名中“新闻调查”(investigative journalism)这个词。前文里奥尔曼的描述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他的定义拯救了“客观”这个词,这个词普遍被滥用了,用来为官方的谎言打掩护。在我开始记者生涯的时候,新闻调查这个名词根本就不存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时候这个词才流行起来,特别是在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揭露水门事件的时候。在选编这本书的时候,我对新闻调查这个词采用了更为宽泛的理解,选编的文章不仅有采取侦查性工作的新闻报道,还纳入了见证历史的报道,以及先源于想法,再调查取证的报道。当年菲利普·奈特利(Philip Knightley)几经曲折,为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作了曝光沙利度胺药品丑闻的报道,该药品导致了1950和1960年代恐怖的婴儿畸形状况。按照我选编本书时对新闻调查的理解,这篇报道能够当之无愧地与历史学家、诗人和讽刺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揭露战争宣传、消费主义和社会贫困的作品并驾齐驱。

我更偏爱那些独行侠式的记者。如果仅仅是收编那些备受赞誉的记者作品以纪念他们在新闻职业中的声望,实无太大的必要,而相比之下,那些特立独行的作品拥有更为持久的感召力。所以,尽管西摩·赫什(Seymour M. Hersh)对越南美来村(My Lai)屠杀的披露已经让自己一举成名,但本书之所以收编其作品并赋予崇高地位,是因为他持续40多年不懈的努力,最终让当局不得不正视。

我必须尽快指出一点,本书收录的新闻作品起始于1945年,这实属我冒昧任性的决定,而且在选编的过程当中,我不得不割舍了一些优秀的作品,以此来避免删节每一篇文章。在此我向那些原本完全应当收录进本书的作者致歉。在我最初的作品目录中,原有一篇是I. F. 斯通(I. F. Stone)1952年对朝鲜战争这段秘史的调查报道。这篇报道向后世昭示出,2003年英美师出无名发动伊战,并不是他们的首创。绰号“Izzy”的斯通毕其一生都在和新闻审查作斗争,可出乎意料的是,斯通的儿子杰瑞米·斯通(Jeremy Stone)拒绝让我编入他父亲这篇划时代的作品。

最好的调查并不总是记者的作品。在本书有关伊拉克的部分有一篇学者乔伊·戈登的文章,她研究了一个很多记者避而不谈,甚至至今还在隐瞒的悲剧真

相:1990年到2003年期间联合国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导致了种种恶果。这场中世纪式的野蛮围困夺去了将近100万人的生命,其中有很多都是儿童。相比起萨达姆·侯赛因天天上头条的那些暴行,“我们”自己的这一滔天大罪却是鲜为人知。

我钟爱的另一段话出自伟大的爱尔兰丑闻记者克劳德·考克伯恩。“任何消息在未经官方否认之前,”他写道,“都不能轻易相信。”说谎是政府的日常工作之一,这是新闻媒体课程从未教过我们的一个事实。如果媒体课程中说起过,那么在政府谎言证据成堆的今天,很多年轻记者相信的玩世不恭哲学也会起作用的,因为记者从来就不会被引向读者、听众和观众的对立面,而是指向虚假的权威。

见不得人的当权者最憎恨尽职的记者:因为他们推开幕布,窥探冠冕堂皇背后的真相,搬起重重压着的巨石。来自权力上层的辱骂正是记者们的荣誉勋章。当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拒绝播放詹姆士·卡梅伦在战时北越拍摄的新闻记录片的时候,卡梅伦说:“他们背后骂我被愚弄了,可是真正让他们懊恼的是,‘愚弄’我的不是他们。”在今天这样一个大公司化的“多媒体”时代,媒体已经被少数几个权力人物运作成了利润的奴隶,很多记者已经变成宣传机器的一部分,却浑然不知。对那些和他们沆瀣一气的人,权力赏给一点微薄的褒奖:共进晚餐的机会,可能甚至是一个大英帝国勋爵的爵位。记者中最为苟安的那些最终成了发言人的发言人,新闻官的新闻官,在法语里这样的人称作“fonctionnaires”,即“机关公务员”。在这本书里我们要赞扬的是那些光荣的特例们,正因为他们蔑视权威,才得以向读者警示了生死攸关的神秘真相。

在英国矿工全国总工会于1984到1985年进行的大罢工中,工会和工运领袖亚瑟·斯卡吉尔(Arthur Scargill)遭到了攻击,政府和媒体在其中都秘密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在索马斯·米尔恩(Seumas Milne)对这一事件无与伦比的揭露报道当中,他认清了当时在很多主流记者“教条主义的坚持”之下,新闻和权力之间危险的勾结。

这件事情很大程度上是个稀里糊涂的混乱局面,由种种独断的权宜之计所造成……英国主流媒体,包括大部分反对党政客,长期习惯性地拒绝深究或质疑政府内部的秘密计划和隐秘的权力结构……这一切的结果就是,英国惯常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已经习惯性地英国政治权力运作的整体层面抛到了九霄云外。而如果对这个层面的问题置若罔闻的话,人们往往不可能把握事实真相。更糟糕的是,那些明目张胆滥用政府权力的人也愈加肆无忌惮……

印度作家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想必也有同感,她曾经赞美了“受压迫的知识”对权力拥有的“权威知识”的“暴动”。对我来说,她的话正描述了我编选

的这本书。这里每一篇文章都卓尔不群地独立于主流之外；所有文章之间的共同点就是记者对“游戏规则”的“暴动”：伯切特在日本，梅尔文在卢旺达，马克斯·迪普雷和雅克·波夫在种族隔离的南非，格雷格·帕拉斯特在美国，京特·瓦尔拉夫在德国，阿米拉·哈斯在加沙地带，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在车臣，罗伯特·菲斯克在黎巴嫩和伊拉克。

保罗·富特对1989年泛美103班机洛克比空难事件及其后不公正审判的调查长达11年，而正因为上述的这一切，他以下面激愤的言辞来总结他的调查：

对梅格拉希（两名被指控的黎巴嫩人之一）的审判和裁决简直是颠倒黑白。可以很公平地说，法官们给所有相信苏格兰司法的人们带来的没有别的，只有羞愧和耻辱。他们还为苏格兰法律添上了不公正的一页，这类的不公正也时常玷污着英格兰的法律。他们的判决是中央情报局的胜利，但却辜负了洛克比死难者的家属们——他们仍然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家人遭到谋杀，他们是怎么死的。

为什么此类新闻报道如此重要？因为如果没有此类新闻，我们对人间不公的感受将会失去表达的语汇，我们和不公正进行的斗争也会没有了资讯的武装。奥威尔的真话将会开始起作用：“被极权主义所腐蚀的人，并不一定住在极权国家。”想想那几百个被迫害和谋杀的记者吧，他们在危地马拉、尼日利亚、菲律宾、阿尔及利亚、俄罗斯和许许多多其它暴虐之国的遭遇正是因为他们的独立勇敢招致了恐惧。

2003年，土耳其议会顺应民众反对土耳其加入对伊战争的一致呼声，投票否决了美国和土耳其军方的要求。一个刀光血影的国家能够空前上演这场真正的民主，完全要归功于记者们的努力，他们一直走在揭露政府罪行的前列，尤其是在镇压库尔德人的事件中。《自由纪事》(Ozgur Gundem)的总编辑奥卡·伊西克·尤尔特库(Ocar Isik Yurtcu)至今还被关在狱中，他被判刑15年，罪名是违反了新闻法，这条法律规定，任何对土耳其境内压迫和叛乱报道都是“夸大宣传或煽动种族仇恨”。政府和军队针对挑战威权的人们制定严刑酷律，约尔特库的情况正是一个典型象征。他和另外数十位独立记者的遭遇极大鼓舞了民众。

在欧洲、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记者通常不必担心有生命危险。英国作家西蒙·路维希(Simon Louvish)回忆过一个前苏联记者代表团在冷战时期访问美国的故事。在读过报纸，看过电视之后，他们十分震惊地发现，所有对重大事件的报道评论都多多少少是同一个声音。“在我们国家，”他们说，“要想得到这样的结果我们得动用专政独裁，我们得要抓人、用刑才能做到这样。可你们这边明明没有

这些事情嘛。”

你们有什么绝招？怎么做到的？

奥威尔有一篇未经发表过的《动物农场》的序言，其中他描述了为什么自由社会中的新闻监管比起独裁社会中的要更加复杂和彻底。因为“不受欢迎的观点可以被消音，扰人的事实可以被掩盖，根本就无须官方的禁令”。从他那时写下这些话至今已超过半个世纪，可是其中的要旨一点没变。

我在这里根本就无意揭露什么阴谋，其实根本就不需要什么阴谋。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们与历史学家和老师们相比没有任何分别，面对掌权者，他们都很容易就会急其之所急，好其之所好，遵循他们所遵循的规矩。正如有着重要责任的其他人一样，他们已经被甄选过，训练过，会自然地将重大怀疑放在一边。如果说还允许他们怀疑的话，这怀疑也不是针对制度的怀疑，而是针对制度执行人的能力或者民众态度的怀疑。

从默多克新闻集团到 BBC，现代媒体俱乐部之间不成文的规定并无二致。界定“新闻”的边界已经看不见，摸不着，这使得假造事件变成了智慧，官方的欺诈得以全天播放。对整个社会的命运的报道要依据其对“我们”有用与否来进行——“我们”这个词也被频繁用作代指西方霸权，连同它的自我陶醉、装聋作哑和玩忽职守；恐怖分子也分好坏，受害者有值得的和不值得的。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理查德·福尔克指出，这样的观念已被作为正统普遍传达，藉由“一种伪善的、单向的道德/法律屏幕。幕布上的影像中，西方价值被大加肯定，无辜的人们被刻画为受到了威胁，一切都在试图证明这场恣意妄为的政治暴力运动的合法性”。这些都被“广泛接受”，乃至“靠法律和道义已经无法辨认出政策的理性与否了”。

这真是极大的讽刺啊：当传媒科技以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的速度发展的时候，不仅仅是新闻报道的老手法，连新闻的光荣传统也过时了。爱德蒙德·伯克（Edmund Burke）曾说新闻界是相对于政府及其利益的“第四等级”（fourth estate），这一概念现在还有吗？在我出道的国家澳大利亚，这个问题似乎已经得到解答了。澳大利亚在历史上曾经拥有激烈的独立新闻传统，可是如今却作为一个缩影展示了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中，自由媒体是如何完蛋的。新闻监测组织“无国界记者”2003 年的新闻自由度年鉴中，澳大利亚名列第 50 位，仅在独裁政府和专制国家之前。这是怎么回事？这又说明了什么？

对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来说，爱德华·史密斯·豪尔这个名字毫无意义，但是人类的三项基本自由权利——新闻自由、代议制政府和陪审团制度——之所以能在澳大利亚生根，这位记者比任何一个人的贡献都要多。1826 年他创办了自己的周报，8 版售价 8 便士的《悉尼箴言报》（*Sydney Monitor*）。在报纸的第一期，他以显著位置刊载了一封读者来信，信中说，记者的功能是做“政府不共戴天的反对者，而